

知识分子图书馆



# 政治无意识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著 王逢振 陈永国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编：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焯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李自修

刘象愚 汪民安 张旭东 罗 钢

章国锋 谢少波

## 《知识分子图书馆》部分书目

- ①文学行动<sup>\*</sup> 雅克·德里达
- ②解构之图<sup>\*</sup> 保罗·德曼
- ③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sup>\*</sup> 斯坦利·费什
- ④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sup>\*</sup> 莫瑞·克里格
- ⑤快感：文化与政治<sup>\*</sup>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⑥布莱希特与方法<sup>\*</sup>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⑦论解构<sup>\*</sup> 乔纳森·卡勒
- ⑧重申解构主义<sup>\*</sup> 希利斯·米勒
- ⑨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sup>\*</sup> 冈特·绍伊博尔德
- ⑩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sup>\*</sup> 罗钢 刘象愚主编
- ⑪抵抗的文化政治学<sup>\*</sup> 谢少波
- ⑫后革命氛围<sup>\*</sup> 阿里夫·德里克
- ⑬赛义德自选集<sup>\*</sup> 爱德华·赛义德
- ⑭政治无意识<sup>\*</sup>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⑮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sup>\*</sup> 特瑞·伊格尔顿
- ⑯本雅明文选<sup>\*</sup> 瓦尔特·本雅明
- 文化研究读本 雷蒙德·威廉斯等
- 历史和人文科学中的历史 拉尔夫·科恩主编
- 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 布鲁斯·罗宾斯
- 后现代性的起源 佩里·安德森
- 吉尔·德勒兹：哲学戏剧 米歇尔·福柯等
- 介入的区域 佩里·安德森
- 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 佛克玛主编
- 性贸易及其政治经济学 《社会文本》编辑部
- 狱中札记 安东尼奥·葛兰西

(注有\*的已出版。)

## 总 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至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至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

么困难，也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赛义德等。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赛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

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

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逊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们无需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桦、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10. 于北京



# 政治无意识和文化阐释

## （前言）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 的《政治无意识》是一部充满挑战性的著作，单是它的大胆的假设——政治视角构成“一切阅读和解释的绝对视域”（《政治无意识》原作第 17 页，以下只注页码）——就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甚至书名“政治无意识”也带有挑战的意味，因为它明显不同于弗洛伊德的信条“无意识不知道历史”。因此人们可能期望这部著作不仅注意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因果论的教训，而且会注意拉康推崇的欲望的概念，以及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推崇的非中心的主体的概念。实际上，詹姆逊的雄心大大超过了书名所引起的期望。他并不满足于政治分析家和文学治疗者的双重作用，把整个文学史当作他的病人。他的主张不只是政治方式会对现代和后现代的其他批评理论进行调和或补充，而且其激进的分析将包容所有其他的分析：

这部作品的基本主题之一是论证马克思主义包容其他的解释方式或系统；或者，用方法论的术语来说，通过将它们的精神活动从根本上历史化，后者的局限总可以克服，它们比较积极的发现也可以保持，这样不仅分析的内容，而且还有方法本身，都会随着分析者被纳入对解释的“文本”或现象的考虑之中。（47 页）

詹姆逊断言，这种总体化的占用和修正活动，将以某种方式使结

构主义思想最有价值的一些原则得到适当的肯定，“赞扬这种观念的强度”（53页），即使德里达和他的追随者“根据差异、流动、散播和异质性等明确否认这种‘总体化’。”（53页）因此从一开始，这种分析就预示了要革除迄今文学批评中的一切弊端，肯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主张——只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才会在推崇历史和推崇中立美学之间达至平衡，才会在鼓吹共时分析和支持历时批评的两派之间进行调和。

詹姆逊的批评实践颇似精神治疗工作：他面对文本的征象，不仅注意明确的叙事，而且注意未说出的东西。他认为，“正是在探寻突然中断的那种叙事的痕迹当中，在把被压制和埋没的这种基本历史现实复归到文本的表面当中，政治无意识的原则才发现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必然性。”（20页）因此批评家的任务是使历史文本本身恢复“充分的言语”。

就文学史而言，詹姆逊认为批评家的分析必须以双重揭示的方式“揭示文化制品是社会的象征行为”（20页）。于是他首先剥去艺术形式的面纱——颠倒掩饰的作用（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掩饰使作者的幻想变成艺术作品）——以便揭示愿望满足的政治部分和文本中意识形态的既得利益。在他揭开文本自身显然不知的意识形态帷幕的同时，他也就揭示了其他批评家在理论实践中的错误假设：他认为这些同行的错误在于完全忽视了文本生产中历史的作用，或者认为历史是文本内容简单直接的机械式的决定因素。换言之，詹姆逊的分析方法旨在研究文本征象的原因，揭示文本赖以生成的意识形态的基质，说明文本如何以这种基质被接受和解释。像大部分现代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一样，詹姆逊的分析集中于文本是一个过程，提出“拆散并解构”它的组成部分，以便揭示它如何发生作用和失去作用。

这种对过程、结构和功能分析的强调，显然可以表明詹姆逊借用了德里达和拉康的理论。但即使如此，他们在詹姆逊的探索中也未能免遭抨击。因为詹姆逊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不仅要避

免“弗洛伊德的主叙事的归纳”——他认为这种主叙事仍然由资产阶级核心家庭的意识形态限定（参见 62—69 页），而且要避免后结构主义的反历史主义或审美唯我论。其实，詹姆逊的主张是：包容这些理论，同时利用它们的洞察来弥补某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短见。他认为这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分析仍然局限于机械因果论或表现因果论的简单概念。

应该说，从辩证的元批评出发，詹姆逊不仅包容其他批评家的话语，而且也包容他自己早期对文本诗学的思考。实际上，《政治无意识》不仅完善并修正了他在《侵略的寓言》里对意识形态本质的思考，而且完善并修正了他在《语言的牢笼》里对共时分析和历时分析兼容性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说，《政治无意识》是对《语言的牢笼》最后的预言性呼吁的反应。他在那部作品的最后写道：

实际上，通过揭露先在的符码和模式的存在，通过再度强调分析者本身的地位，这里预见的阐释学将重新把文本和分析过程向历史趋势开放。……在我看来，唯有以这种发展或类似的东西为代价，共时分析和历史意识、结构和自我意识、语言和历史这些孪生的、明显无法比较的要求才可能得到调和。（原书 216 页）

确实，在《政治无意识》里，詹姆逊通过使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更新换代”，极力“使文本向历史趋势开放”。他用“符码转换”的概念代替“调和”的概念，并将“符码转换”限定为“发明一套条件，或战略性地选择一些特殊的符码或语言，如此同样的术语便可以用来分析和连接两种迥然不同类型的客体或‘文本’”。（40 页）当然，整个詹姆逊的批评构想，尤其是《政治无意识》的阐述，都可以看作是对弗洛伊德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符码转换”的实例，其目的就是“调和”个人主体和集体

历史“孪生的、明显不可比较的要求”。这种“调和”无疑也符合詹姆逊调和共时和历时分析方式的要求。这一事实在詹姆逊的三层次文本分析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詹姆逊提出，要用符码转换的方法首先在文本的局部历史语境中研究文本，或者说它与历史事件的“历时性”关系；其次在文本与那个生产文本并把文本作为工具使其统治合法化的阶级的关系中研究文本，或者说把文本作为传递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素的工具同时进行共时和历时的研究；第三在文本与整个生产方式的关系中研究文本，采取一种考虑更大历史视域的系统的和共时的看法。第三个“共时的”层次尤其重要，它将使批评家不仅研究文本的生产，而且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对它的接受，研究它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的效能和用途。

通过符码转换和三层次文本分析，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里发明了一种新的阐释学。这其中涉及到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包括解释政治的元批评问题，即解释活动的有效性和动机以及从中产生的隐喻。第二个问题因后结构主义者而显得更加重要，它包括历史的再现问题。詹姆逊认为，有两种不同的、相互对抗的叙事力求再现历史：一种是线性的，另一种是交迭的；一种强调历时性，另一种把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区分纳入一个整体。后一种更复杂，也是《政治无意识》重点解决的问题。

詹姆逊认为，在今天的文学批评里，传统的文类理论受到广泛的怀疑，其缺陷主要在于它的简单的类型化倾向，非自觉地将文本纳入它的文类区分，把它的纵聚合的线性作为一种文学的历时性的模式。但是，恰恰是这些缺陷的原因，才使它使詹姆逊的元批评产生价值。詹姆逊指出，不论它的范畴局限还是它明显的非共时模式的启示，实际上都变成了传统文学史的错误的征象。由于这些原因，他的论文类理论的第一章以具体的方式重新阐述了有关的讨论。正如我们在他对吉辛的讨论里所看到的，詹姆逊提出了一种以积淀的形象来代替文类或叙事形式的概念，其中文类

被重写为社会象征信息或叙事构成的综合，充满了生活现实的意识形态内容。因此，不论叙事结构看上去多么“理想”，也不可能真正以简单的类型或形式归成文类。詹姆逊认为，每一种文类形式都是该形式多种不同运用经过竞争后的残存。不过，这里会出现某种类似“统治结构”的东西，或者说主导因素以对立的方式与所有它的其他历史可能性共存。按照詹姆逊的看法，这不仅是一种数学的组合，因为每一种“形式”，每一种文类—叙事模式，就其存在使个体文本继续发生作用而言，都负荷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就每一种文类模式丰富多样的因素而言，这意味着解释文学史的一种合适的方式——文学史是积淀的现实的矛盾而有意义的运作，是一种非共时的共时性，一种企图解决共时表现和过分确定时刻表现之间的困境的历时模式。

通过把小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詹姆逊对所有这些都作了最好的说明。在詹姆逊看来，小说有争议的形式和文类的性质使小说成了元分析(meta-analysis)的最佳客体。在集中论述曼佐尼的小说《婚约夫妇》时，詹姆逊并没有把它作为“文类不连续”的佐证。如像对吉辛那样，他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叙事形式，他把这两种形式读作两种不同的“文类模式”——一种是哥特式的，具有内向和心理化的倾向；另一种近似流浪汉传奇，再现了“社会生活的经验”。这样，曼佐尼小说的总体性便暴露出来，揭示出远比任何有机整体的模式更有意义的张力和不一致性。这就是说，在一个文本内部，不同的叙事形式或“文类模式”可以共存，并形成有意义的张力。不仅笛福和理查逊的模式可以共存；而且菲尔丁的合成式的小说也可以沿用这种揭示文类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的方式来阅读。

但是，小说并非只是被动地记录这些异质性。詹姆逊还清楚地看到曼佐尼叙事艺术的独特性：它采用了重构多种意识形态素的方式。小说是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它必须把异质的叙事范式重新统一或协调起来，尽管这些范式有其自己独特的、矛盾的

意识形态意义”(144页)。按照詹姆逊的看法,文本作为“社会的象征行为”会以辩证的方式把文本和语境统一起来。任何这种文本的历史都必然记录文本存在的所有这些层次;而其所用的方式基本上是在特定时刻阐述异质事件共存的一种历史的方式。于是,再现历史变成了对其多样性理解的一种综合行为;而再现历史的问题则成了用以组织并认识其意义的模式,它将画面纳入过程,将人物纳入修辞活动。

于是,詹姆逊的作为叙事的历史再现便成了抵制单一修辞方式的一种自我意识的修辞方式。但这里有一个悖论,就是说,每当我们企图了解历史的意义时,历史提供给我们的只是大量的转义。因此詹姆逊指出,承认问题并不是放弃历史转向纯粹的意象;相反,真正要放弃的是它的熟悉的线性。最终,如果历史是一种叙事,那么它就是一种没有真正开始和结束的叙事,其中过去和现在不断发生对抗,而且没有任何对抗会在目的单一的统一性中产生。如此一来,它便从根本上把德里达的“痕迹”(trace)概念政治化了——每一个时刻都是过去和未来、“残存”和新生的交迭重合,永远不能以原有的纯洁性来了解。于是詹姆逊认为,“革命”只是这种叙事过程公开的力量,而叙事只能理解为一个过程:

正如公开的革命已不是定时的事件,而是使革命前作用于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的无数日常斗争和阶级分化的形式浮于表面——这些斗争和形式潜伏和隐含地存在于“前革命”的社会经验之中,只能在这种“真理时刻”作为后者的深层结构显现出来——同样,文化革命的公开“过渡”时刻本身也不过是人类社会中某一持久过程的过渡,或各种共存生产方式之间持久斗争的过渡。因此,一个新的制度的主导因素上升的胜利时刻,只不过是它为了使自己的主导地位永远保持并再生而不断斗争的历时表现,这种斗争必须在它生存期间一直坚持下去,并在所有时刻都伴随着那些拒绝同化、寻求

支持的旧的或新的生产方式的系统或结构的对抗。在这最后视域内如此理解的文化和社会分析的任务，显然是对其素材的重写，从而使这种永恒的文化革命可以得到理解并被解读为更深层的、更持久的构成性结构，而在这种构成性结构里经验的文本客体也可以获得理解。（97页）

从修辞方式到解释，从再现到分析，并不意味着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詹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具体问题倾向于围绕着调和的范畴展开。但“调和”是卢卡契和萨特被指责的术语之一。攻击的特定目标是卢卡契的发生学方法，按照这种方法，调和的理论会促使人们了解某种绝对的始源，某种在主客体之间、在真实和它的认识之间尚未分裂的“原始”的统一。詹姆逊认为，这种攻击并不是误导，对卢卡契进行解构肯定有启示意义，因为甚至《历史和阶级意识》这样有力的著作，也倾向于将意识形态生产的特殊问题纳入有绝对始源的更简单的叙事。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批评应该意识到自身的盲目性和洞察力。甚至应该按照保罗·德曼的论点，把卢卡契有力的洞察置于他的盲目性之中，重新评价他对物化和资产阶级思想中的意识形态封闭性的结论。

詹姆逊认为，人们对调和与发生学方法的抨击，无论如何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应该探讨的重要问题。但问题会不断扩展。例如，如果不更仔细地考察调和的有效运用，就不可能从一开始便放弃使用调和的理论。詹姆逊把这种指责看作是对历史“表现”模式的一种小心的指责。这种模式怀疑任何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理想主义，即认为调和是一种从明显层次（上层建筑）到潜在的本质核心（基础）的运动。不过，对詹姆逊而言，这种批判并不等于完全否认调和是解释的范畴。相反，他认为那种对表现因果论的攻击，同样也是对阅读中的寓言倾向的一种局部的、策略性的攻击。因此，这样一种批判最好在具体作品的语境中来理解，以便通过在两个层次之间假定的同源性来解决基础最终决定上层建筑

的整个问题。这样一种关系在某些实例中可能有效，但作为一种理论却不够充分，因为它不够辩证。换言之，同源论只是旧的反映论的一个变体，本身就构成综合过程的一个障碍，而文本和语境、基础和上层建筑正是依靠这种综合过程才相互连接起来。可以说，同源论模式最终使丰富的进行调和的实例（如人的主体、家庭等）物化了，脱离了任何真正的有效性。

为了避免上述那种简单的归纳，《政治无意识》提出了一种精心构想的调和机制。正是这种构想，尤其把“叙事”用作一种多向调和的符码，表现出了詹姆逊综合的独创性。首先，在对纯表现性的因果模式的否定当中，詹姆逊排除了调和的局部性。在他看来，每当人们试图理解异化的现实时，这种调和就不可避免；我们必须运用——发明——一种符码，一套术语，“用来分析和连接迥然不同的客体或文本，或两种极不相同的现实的结构层次”（40页）。詹姆逊指出，调和是给予意义的过程，是普遍的“符码转换”活动。在这种意义上，调和机制中的意识变成了理解中的自我反应的同义词。于是对调和理论的思考便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不可回避的问题。

詹姆逊认为，“叙事”作为最高的调和构成可以使我们将意义的概念非实在化，集中于意义的生产本身。无疑，这种看法背后存在着一种对文本的看法，但不是把文本作为“外在于那里”的某种东西，而是作为某种本体论基础内在于我们解释行为之内的东西。对詹姆逊而言，解释就是不断介入争论，而阅读的真理一价值则在于它们作为批评分析的力量。惟一排除某种解释的方式就是提供一种更有力的解释。詹姆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最有力的解释，因为它们具有必需的包容性，具有元批评的复杂性，有能力吸纳并完善其他方法论的片面解释。

批评具有包容性但又不易否定为整体性，恰恰是作为调和的叙事所具有的那种悖论式的优势。在詹姆逊的批评论述里（如论



康拉德和巴尔扎克的部分),作为范畴的叙事证明是文化分析最合适的一种方式。其中对欲望和意识形态的叙事构成的注意,对只能作为这种构成的开放和封闭系统的历史的注意,表明了整个文化生产的戏剧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詹姆逊的实例中,它使我们能够在叙事化的行为中记录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而不是把它作为同源的一种简单的反映或创造。詹姆逊认为,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应视为在意识形态或象征领域内解决更基本矛盾的一种综合行为,因为这些矛盾在政治或社会—经济层面上被连接起来。通过这种对象征的有力的重构,我们可以进入组织文本、作者和历史语境的整体网络。

在詹姆逊论巴尔扎克的那部分,上述情况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篇文章主要论述主体的独特构成过程;按照拉康的精神分析,它也是整个批评的核心问题。然而,政治的分析必然将拉康历史化,说明他形式范畴中的构成的历史性。詹姆逊认为,巴尔扎克《老姑娘》的典型价值在于它记录了主体构成中的转换方式,通过这种构成中的多向性,文本组织安排作者的深层欲望,披上了作者欲望的外衣。而且,这种欲望必定是政治性的,它们交织着巴尔扎克的保皇主义,也交织着他整个作品中明显的“社会性”主题。詹姆逊指出,就这些欲望本身而言,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因此就有了巴尔扎克的“叙事机制”固有的兴趣,即调整并实现欲望的兴趣,叙事机制可以作为“‘力必多’的投入或作者的愿望满足,在这种象征的满足形式当中,传记的主体、‘隐在的作者’、读者和人物之间的有效区分实际上已被抹去”(155页)。于是,詹姆逊认为,对这种叙事机制进行微观物理学的考察,对其更大的结构进行研究,可以打开巴尔扎克文本所用的特殊“调和”方式,通过这些方式,他的文本探讨、连接、解析了在其亚文本层次上的主要矛盾。

在詹姆逊的分析里,叙事的主要动力变成了一种乌托邦的冲